

第四章 女人從家庭「出走」之經驗歷程分析

本章將貼近媽媽土風舞班的成員們，走出家庭參與團體的實際經驗，分別由不同的面向闡釋分析其意義。

第一節 參與土風舞班的動機：空巢期失落的補償或隱匿的主體聲音

對於孩子已離家、所謂空巢期婦女走出家庭參與社區活動的動機，一些研究均指出，是爲了填補失落的心理感受，加上孩子離家之後家庭主婦時間的剩餘、生活的空白必須填補（吳慎慎，1989；林淑娟，2002:50），也是成人教育以及社工系統中常見對於中老年女性的角色與生活狀況認定。關於空巢期的論述源於發展心理學的發展階段說，其中 Sales(1978)提出「成年婦女」的八個發展階段，其中 30~34 歲是「再適應期」，此時期子女進入學校，使婦女產生認同危機，開始外出工作、到學校上課或參與自願活動，以尋求個人自我實現。另一個階段是 44~47 歲的「中年危機」，婦女因爲更年期與空巢期產生心理不穩（吳慎慎，1989:42）。李宛澍(1996:93)認爲發展階段論是以異性戀婚姻與家庭意識形態爲假設，認爲女性在子女長成離家之後，頓失照顧子女的責任，也失去認同；然而此種將婦女走出家庭私領域進入社區視爲失落的補償或移情效果的邏輯，忽略了女性的主體選擇，並且「將母職和女人在婚姻中的矛盾，預設成既定的邏輯。」

在研究田野中，成員們加入土風舞班的時間歷時約十年至二十年，以個人的生活狀況來看，幾乎均在孩子就讀國中的階段，此時期孩子在早晨能夠自行打理穿衣，成員因此能夠在清晨（五點半～六點

半)外出運動一個小時再回到家中照顧孩子上學事宜。顯見母職仍是成員們生中的首要任務與責任，其他活動的安排均是以不影響「家內事」為前提，婦女走出家庭的時機是受制於父權社會中對於女性(母親)角色的認定，照顧的責任當然歸屬於母親或女性，只要家庭中有照顧的需求時，女性(母親)的其他活動完全不具備正當性，並且隨時可中斷。

大概十幾年前，我參加不到幾個月，後來就是我先生他中風，後來什麼讀英文、跳土風舞都沒辦法參加，就放棄就是全心照顧我先生(受訪者 A-03)。

我之前就是小孩子讀國小的時候，我有出去一段時間，可是後來發現小孩子因為比較小，她不會自己打理，我就停下來(受訪者 G-01)。

成員們走出家庭參與活動的時機受限於家庭中的照顧與母職工作(在母職或照顧工作告一段落時才能參與活動)，若以此推論婦女的心理滿足與失落均源自照顧與母職角色，因此在孩子長成或離家時必須以活動參與來填補心中空虛，這樣的推論是加強父權對女性角色的刻板化設定，並且忽視女性主體的聲音。在田野中，成員參與土風舞班的動機主要有三種：

(1).對跳舞有興趣

我鄰居招的啦，招去跳，大家就一對一對大家都招去跳…我那時都有興趣跳舞才去跳，跳下去就十幾年(受訪者 C-01)。

受訪者 H：那時我在清旅社，旅社老闆娘跟我招，我就說好阿來跳舞，我那時很勤勞，可能對跳舞比較有興趣，開始去學。

受訪者 I：她卡有舞蹈細胞，老師的動作看一遍就會了(H-01)。

(2).身體因素

我還沒出來運動時，站著不可以超過五分鐘，那時身體不太好，站太久就會昏倒..，剛生完小孩一邊要帶小孩一邊要工作，晚上要起來好幾次，太累，那時身體一直不好，也沒有運動，就是上班晚上回家就要帶小孩，幾乎沒什麼休閒的東西，我本身也是低血壓，有出來運動之後改善體質，運動真的是很好(受訪者 G-01)。

(3).「朋友『招』耶」，走出家庭與他人連結

她（在長青學院認識的朋友）跟我說要出來，不然待在家裡…（笑）..，陳老師又跟我叫，再出來啦，可是我不會哪，沒關係啦，你看得懂就慢慢學(受訪者 A-03)。

那時都是在家車皮包，她（婚前就認識的朋友）就說要出來運動，不要一個人躲在裡面(受訪者 F-01)。

社工或成人教育系統引用發展心理學關於成年婦女發展階段的論述，將婦女參與社區活動的需求與動機定義在母親角色與責任的失落，是忽視了父權文化如何將母職與照顧工作建構為女人職責的社會力過程，在此框架下推論的女性需求是否就是女性主體真正的聲音？

從田野的觀察訪談發現，成員參與土風舞班的動機包括「對跳與有興趣」、「促進身體健康」的動機，家庭主婦缺乏休閒、運動、沒有所謂上下班時間的生活形態，加上多數成員在家務之外同時在家從事家庭副業（家庭代工）或繁重的照顧工作（重病的家人），經年累月的結果，頭痛、手腳冰冷、腰痠背痛等病症纏身，以運動增進身體健康的需求顯著。

最後是「與他人連結」的動機，當研究者問及成員參與土風舞班的過程時，「相招」與「出來」是成員常用的語言，通常鄰居或朋友相伴參加或者被鼓勵參加。雖然是在非都市地區，然而在居住及建築形態上已漸漸朝向都市化趨勢水泥樓房取代過去農村社會的平房及三合院：

可是以我的感覺喔，像我娘家我媽媽那邊，是那種古早厝，有廳神跟護龍，那個房子（音調稍微提高，聲音也比較大聲）就是較早起的厝三合院那種，一間一間門都相通，你就是從這邊看到那邊去，如果門沒有關起來的話，就整條都看得到，後來改建變成說古厝都敲掉，給建商起分的，現在回去也是個人門戶，那個門都關住住，跟以前感覺就不一樣，然後很奇怪覺得現在跟以前都不一樣，現在若是回去家裡也是每一戶個人的門都關住，就比較沒有說有來往耶。（受訪者 A-04）

在研究田野所在的非都市地區，因為居住形態的變遷，人與人的互動減少，不須外出工作的家庭主婦處境更加孤立了，走出家庭參與社區活動有助於主婦破除個人孤立的處境。

第二節 參與策略的運用

有了參與動機之後，成員們走出家庭的過程又是如何？從訪談資料中發現其中有許多策略的運用，以下略分為團體與個人的策略運作，並且試著探究其意義。

一、團體運作策略

土風舞班 leader 陳老師提及為了使成員們順利地進入團體並且持續的參與活動，她認為最好的方式就是夫妻共同參與，或是讓成員的先生成為成員團體網絡的「外圍網絡」：

最重要就是又把我們先生帶出來，這樣子一群，讓先生知道說太太這個舞的方面其實是一個正當的運動，我最主要當初一直邀先生出來，就是說不會去反對，有些先生會反對太太去跳舞之類的東西。……在以前一定會有阻力，那有阻力的話，太太一定沒有辦法長久投入，就會離開這個團隊，所以我的意思比較喜歡剛開始比較會有慶生會，聚在一起的時候，就邀先生過來看看我們的團隊是什麼，我們當場把我們所學的展現出來讓先生看，後來更鼓勵男生唱歌我們跳舞，這樣他瞭解原來就是這樣一回事，就會鼓勵太太出來。(受訪者 B-03)

在跳舞以外的成員聚會中，如為成員舉辦的慶生會，將先生引進團體中，藉由了解使土風舞班的活動透明化，以化解先生對於女人在家庭外活動的疑慮。而這些先生們的疑慮又是什麼？

就是怕以為說跳雙人舞跟男跳的話會有第三個介入，土風舞一下子我們不讓男的插入，我們純粹是女生的活動，運動玩之後大家還是回到家，只是把自己的身體健康，而且我覺得跳舞的人好像都很愛美，我的意思是說很有活力，有活力就美不一定要化妝喔。(受訪者 B-03)

將土風舞班定位為一個純女性的團體，並且將跳舞界定在「運動」的範疇，不與「美」作直接的連結，目的均是為了取得男性的信任，為成員爭取更大的參與空間。

二、個人使用的策略

在成員個人部份，成員以不影響做「家內事」為爭取外出的籌碼，因此土風舞班的活動時間是定在清晨五點半至六點半，媽媽們犧牲自己的睡眠時間換得外出活動聚會的機會，結束後回家接著做家裡的工作，是以不影響家務與母職工作為前提的時間安排。在參與契機上，也是等待孩子長成「離腳手」，不需要時時刻刻照顧其需求時才跨出家門參與社區活動。

我就起床還沒天光，給我們一個小時的時間去跳，回來就開始做家裡的工作，算不會影響家裡啦，不會啦不會影響到。……也是要先想看看，要是會影響到就不敢、就不去了。(受訪者 C-04)

此外，讓活動過程透明、表明團體的性質也是成員個人使用的策略之一：

…念的時候就不管他，習慣了，像如果出去運動，早上，運動完如果時間沒那麼趕，大家會在那邊聊天聊一下，若聊天的話會比較晚回去，然後他會看時鐘，幾點了才回來，他就會說幾點去幾點才回來，我說啊在那裡開槓不行（笑），阿如果不相信的話，你知道我禮拜幾在什麼地方運動，你可以去看啊，好像有點沒有安全感，算說會疑心，他對自己沒有信心。（受訪者 A-05）

策略的運用是為排除障礙，對於家庭主婦而言最大的阻礙就是傳統父權文化之下的兩性分工模式，將女性置於家庭私領域中並且賦予無酬的再生產勞動，策略的應用，讓成員獲得走出私領域的正當性基礎。然而，此種策略的使用是在整個父權文化結構中暫時獲取妥協的空間，並非永久的改變，家庭或家人的需求仍為第一優先，例如成員必須重拾母職¹的時候，往往就要中斷團體的參與；或者家人有照顧需求時，離開團體也是必須的，等到照顧工作告一段落再回到團體，成員因為家中的照顧工作而進出團體是土風舞班裡常見的情況。

三、再思考：父權對女性身體的禁錮

媽媽土風舞班維持純女性的團體組成模式，除了土風舞本身的舞蹈性質在性別印象上被刻板化為適合女性的活動，團體領導者與成員有意識地迴避與男性的身體接觸也是形成純女性團體的原因：

像那時我出來跳舞的時候，xxx 老師（男）在跳，我自己心肝裡也覺得說怎麼男生在教，我也是覺得怪怪，所以我也是想說選 xxx 老師（女），比較不會讓家裡的人覺得產生誤會，有的沒的不必要的麻煩，…其實那時候真的會這樣想，擔心家裡給我們反對這

¹ 詳見本文章節「2.3 重拾母職—母職制度的延伸」。

樣，想說我們就是愛出去運動交朋友，為了避免他們反對，就可以說我們老師也是查某，可以很大方的這樣說(受訪者 E-02)。

透過婦女參與土風舞這樣一個據身體意象的活動，女性的身體在整個社會環境中如何被看待得以顯現，其中也包括女人自己。女人若是以自己的身體為「主體」，由內去感受自己的身體，這代表試著去滿足自己的愉悅需求，知道自己的需要是什麼，由內心感覺自己是一個完整的人(Magezis,2000:148)；而在上一段的敘說中，受訪者對於自己身體的意識顯然落入的主/客體的矛盾中，一方面參與土風舞的活動是滿足自己運動交友的需求，但同時卻又必須顧及其他人對於身體是否將與男性有所接觸的疑慮，這是以外人的眼光來看自己，將自己的身體與自己區分開來成為「客體」，更確切的說是站在父權的位置上觀看自己的身體。面對此間的衝突，受訪者同樣使用了妥協的策略，以選擇同為女性的老師作為可能與父權規範衝突的解決之道。

而我們要探究女人如何失去對自己身體的掌控，劉仲冬(1995:221-222)以男性生產(production)與女性再生產(reproduction)的差異以及中國傳統家族的運作與繼承，闡釋父權社會如何禁錮女性的身體。前者意指工業社會以來形成女性居於依賴弱勢地位的生產模式變遷，男人佔據生產工具，生產的是可以累積的財產（具市場交換價值），而女性的再生產包括生育、母職與照顧工作，均無法累積與交換而成為無產者、地位低落。男性在財產積累之後必須有繼承制度處理生育及財產間的關係，在中國傳統的家族宗法制度運作下，父系家長為確保財產與血緣的繼承，不僅控制了女性的身體與生育，並且將片面的道德規範加諸其上（對於兩性的身體及情慾有不同的道德標準），男性為了保證家族血統的正確，女性守貞變得非常重要，因而女人的身體在家庭以外出現似乎時刻都在刺探著父權對女性的片面道德規範。「這樣的態度至今依然存在於我們社會。這樣的父權機制像天羅地網使女性無所遁逃，甚至讓許多女性也視為理所當然(劉仲冬，1995:222)。」

土風舞班因為舞蹈與表演活動的形式，直接觸及父權社會對於女

性身體的掌控焦慮，無論成員主動選擇女老師、讓活動過程透明化、維持純女性的成員組成，均是成員們為了滿足自我身體的需求，同時符合父權對女性身體的道德規範所採取的策略。

第三節 從家門內到家門外：女人在家門檻上進出

在土風舞班成員們的互動或與研究者的訪談中，「出來」此具備空間意涵的用語頻繁地出現，對於成員們而言，用語的背後所承載的共同的生活、生命處境與經驗，似乎是不言自明的：

阿小孩大了我們就可以出來，要是沒有事情就出來阿。(受訪者 D-02)

鼓勵我說要出來，不然你沒出來外面的一些事情都不知道，多認識一些朋友。(受訪者 A-03)

然而對於研究者而言卻思忖著，「出來」的過程必定對應著「進去」的過程，從哪裡出來又是進去哪裡，進去與出來所跨越的界限又是什麼，對主體本身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我從「女性主義地理學」中試圖描繪出更清晰的面向。二十世紀末，地理學領域因為各派女性主義觀點的的啟發，開始在空間中探尋性別(gender)的社會建構過程，而漸次發展成「女性主義地理學」一個嶄新完整的研究取向，將社會建構的性別建構納入地理學的思考中，認為若不了解在社會運作中的性別角色，就不可能對男女的性別空間做合理的解析，更不可能對依賴著、以及影響空間行為的社會制

度作更有力的解釋（張雅雲，2003）。

其中，學者 Weisman 進一步提出空間的三層領域結構，包括「物理空間」、「社會空間」及「形上學空間」，這三個領域構成了結構人類經驗和界定人類現實的象徵世界。空間提供了一個架構以便思考世界和身處其中的人，直到我們知道我們在哪裡了，我們才知道我們是誰。在父權社會裡，男性被界定為支配的群體，從包括物理空間、社會空間到形上學空間都是男性的經驗、意識和控制下的產物，而父權的象徵結構便是二分法(dichotomy)的概念，將人們區分為富裕/貧窮、年輕/年老、男人/女人、勞心/勞力等對立的群體，以便創造一種合法化與支持、剝削人類，維持男性主導的社會系統(Weisman,1997:16-18)。

在此應用 Weisman「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的概念，試圖將成員們所使用的語言以空間意像化，期能更清楚地呈現家庭主婦的生命處境與過程。工業社會形成以來，家庭從原本同屬於勞動生產的一部份，因為新的工作形態與工作場所的形成，女人逐漸與家庭領域、照顧家庭與小孩等事物連結起來；男人則逐漸與公共領域、賺取薪資及政治參與等事物聯繫起來(Abbott & Wallace,1995:110)而形成了兩個對立的「社會空間」，男性以及其所存在的公共領域被賦予了權力與地位，而女性以及其所處的私領域責備剝奪權力，淪為弱勢。而在實質的「物理空間」上，Weisman 認為在每個人的腦海裡，關於物理環境的認知地圖或心靈圖像，大部分是我們所佔有的社會空間而定(1997:16-18)，亦即在社會空間中，當男人與女人分屬於強勢與弱勢的對立空間中，也反映在兩性實質的物理空間使用上。本研究中，受訪對象提及參與土風舞活動前後的生活：

那時就是只有小孩子家裡小孩子家裡這樣子，比較沒有踏出來，現在小孩子長大了，我們可以安排自己的一些生活，跟以前小孩

子唸書的時候比較不一樣，比較有自己的時間，不會被小孩子綁的緊緊的(受訪者 G-02)。

參與社區活動以前，成員們因為沒有外出工作，以照顧小孩與家庭為中心的生活形態，因此幾乎都在家庭附近的空間移動，如鄰里、市場；相較於男人外出工作的移動範圍與移動能力，其實質物理空間的範圍差距極大。對成員而言，婚姻使其離開工廠的工作進入家庭，也進入了私領域這個社會空間，實現父權對於兩性刻板的分工模式，擔負起家務與母職的職責，同時生活的範圍也逐漸縮小為以家庭為中心的範疇，這是「進入」的過程。在孩子長成離家的時候，成員們因為參與社區活動（土風舞班）與其他的女性連結，在其中所形成的女性情誼與女人網絡，不僅逐漸擴充婦女個人的生活空間，同時增加其移動的能力與範圍，擴大期現身的物理性空間，這是「出來」的過程。

若以成員參與團體前後生活上的物理性空間分布來看，可以明顯地看出其間的差異，在與其他成員連結之後，因為成員們分布在不同的位置而形成擴大的網絡，持續地參與社區不同的活動也增加女人在社區中現身的機會，然物理空間的變遷是否意味著社會空間也獲得相同的進展？社會空間包含社會規範、意識形態與社會體制所形成，影響個人意識或意志自主的範圍，對於家庭主婦而言，女人網絡的形成對於破除物理空間的限制有極大的助益，女人們「相招」跨出門檻進入社區，但是公私領域的二分界線仍顯而易見，例如不影響家務與母職是成員跨出家門的前提，家中有照顧需求時女人成為當然提供照顧人選，女人的社會空間出現了卻是以若隱若現的姿態存在，成員們也在家門檻上進進出出。

第四節 女人網絡在社區中現身

成員們跨出家門檻之後，進入團體在社區空間中經由個人與個人的連結，逐漸形成互動密切的網絡。

女人網絡的建立

成員在參與土風舞班之初，通常由認識的人介紹或以「相招」的方式一起參加，訪談對象中除了一位是當時工作的老闆介紹，一位是在長青學院上課時認識的同學介紹，其餘均是與厝邊鄰居三三兩兩一起加入。成員們參與土風舞班之後，將這種「地域性」的鄰里小網絡結合擴大，並且因為在過程中逐漸發展的團體認同與情誼，網絡在「心理與情感」上的意義更為重要，網絡不僅以超越了地域上的限制，同時亦增加了成員的位移動能與範圍，包括到彼此的家中拜訪、一起參與社區活動、安排出遊活動等，擴大了成員的生活範圍。

網絡的功能

土風舞班形成的網絡在成員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以下節錄自研究者對該網絡的觀察記錄：

接近中午時和母親在一樓的客廳裡聊天，門外有人騎機車停在門口，是母親土風舞班的「舞伴」（母親對土風舞班成員的稱呼），王阿姨送來母親訂購的除夕那天拜拜需要的年糕，阿姨並且好奇地問母親為什麼只買了一個，因為通常拜拜時年糕放在案頭是要一對的，母親解釋說，因為真的吃不了那麼多年糕，所以另一邊

她都以水果替代，心誠即可。阿姨聽了也附和，「對呀，年糕每年都吃不完哪。」阿姨離開後，母親告訴我因為阿姨有一位親戚是作年糕的，所以她們土風舞班的舞伴們一起向她訂購，比較便宜，阿姨則負責將年糕分送給大家。下午我陪母親上街，我們順路到也是土風舞班成員陳阿姨家，母親把上次大家一起在另一位舞伴家製作花生糖的材料費給陳阿姨，母親說大家一起做，買材料可以便宜很多。

很明顯的，土風舞班所形成的網絡功能包括交換資訊、共同購物、學習料理以及休閒活動的安排等，因為成員們的生活主要仍以家務為中心，因此互動交流的內容仍不脫離家務的範圍。然而過去是個自在孤立的家庭私領域中完成的家務工作，現在因為網絡的串連，家庭主婦們可以離開各自的家庭，聚集在一起分享學習或一同完成，心理的感受是有很大的差異的，正如同 Oakley(1976)的研究指出，家庭主婦對於家務工作的不滿意，並非來自家務工作的瑣碎與單調無變化，而是「無法與他人互動的孤單感」，藉由網絡的建立，破除家庭主婦在家中的孤單處境，給予彼此情緒即心理上的支持。

此外，成員們以土風舞班的網絡為基礎，時常「相招」一同參與社區中的其他活動，例如農會體系的「家政班」（包括烹飪學習或編織等課程）、長青學院（由學校主辦、政府補助的成人教育系統）開辦的各項課程，並且在一些活動中負責土風舞表演活動，均增加女人在社區中現身的機會，擴展女人在社區中的空間。

第五節 女性情誼：大家都是「跳感情」的

土風舞班的成員們對於彼此之間關係的認知，多已超越僅僅是早晨一同跳舞運動的夥伴，而以生活中的「朋友」定義。對於成員而言，過去未參與社區活動時，人際網絡主要由左鄰右舍及親屬網絡構成，一位受訪者曾提到自己「以前好像都沒有朋友」，若遇上情緒不好的時候，她說「沒有朋友，跟姊妹說，有時打個電話說說。」在成員過去的人際交往中，女人在其中並無其主體性，而是依附在妻子、母親的角色下，成為某太太或某媽媽，而「朋友」對於成員的重要意義就在於是自己為主體所建立的人際交往。

更多的受訪者是以「姊妹」來定義彼此之間的關係密度，一位成員甚至指出自己的親姊妹有的在台北或其他城市，不一定在附近，難得相聚，而土風舞班的成員們一個星期至少見面三次（每個星期的二、四、六早晨），她說「我覺得快要比親姊妹還好」。

成員之間並且常以「我們是跳感情的」這句話為團體及成員之間的關係下一個活潑且生動的註解：

我們土風舞的朋友是不錯哪（怎樣不錯？）大家好像姊妹，親姊妹（笑開來了），大家都是跳感情的。（受訪者 D-01）

我們怎麼會說是跳感情，就是我們這些大家個性都很合，大家都很有知己，不會說一些有的沒的，會互相照顧。好像形成自己的姊妹，可以談心。有什麼不舒服都可以說出來。你看我現在一個禮拜去一天，我也很執意要去，來去最無也大家說說笑一笑。……我們這一群就是都可以說的，跟先生口角阿，跟媳婦不合阿，都可以說出來。（受訪者 I-01）

Bulter & Wintram 在《女性主義團體工作》中提及，友誼對個人的成長、獲得支持與改變都有正向的幫助，也必然與婦女心理福祉 (well-being) 有正向關連，而婦女團體本身就提供了充足的證據顯示藉由自我揭露以及物與類聚確認彼此為友。Karen Sacks 在《姊妹與妻子：性別平等的過去與未來》一書中，從生產關係的歷史脈絡分析女性社會關係（包括 sisterhood、motherhood 及 wifefood）與社會地位的轉變，為姊妹情誼 (sisterhood) 對於女性的意義提供更深一層且清晰的圖像。

Sacks 指出姊妹關係隱含著一種「成人關係的自主性」(autonomy of adulthood)，其存在必然在一個個體皆平等擁有的團體中，例如在前工業社會中是以整個家戶為經濟與生活單位，保障了婦女某些的姊妹位置，婦女的勞動同屬於社會勞動的一部份；而當資本主義社會興起，家庭不再是生產的單位，家務關係被工業生產模式轉變，女性的勞動成爲一種私人勞動的性質，因而女性在經濟上依賴男性，社會地位下降。另一方面男性以擁有土地的權力成爲統治階級，逐漸摧毀姊妹關係的基礎及女性的權力與自主性，女性由姊妹和妻子的關係轉變爲僅有妻子與母職的關係，從自主的成人變成屈從、依賴關係；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與體系中，妻子關係 (wifefood) 與母職關係 (motherhood) 被堅信爲是女性本質，而否定了姊妹關係 (sisterhood)。

因此，婦女團體對於重建女性姊妹情誼的社會關係是一個很重要的切入點，女人以自己爲主體進入團體中，與其他成員互動交流，在土風舞班中成員們均以名字相稱，甚至是「指名道姓」地，女人還原自己原來的姓名，而不在躲藏於某太太或某媽媽之下，女人在團體中體現人與人之間平等的互動關係。

第六節 在團體中逐漸浮現的女人自我：在關懷自我(caring self)與動力自我(agential self)之間游移

女性主義團體工作者認為女人透過與他者一同作為社會中一份子(individual-in-society)的經驗，可以創造出女人的自我知識(self-knowledge)，因而女性團體正是女人進入自我的窗子(Butler & Wintram,1991:105)。在女性團體中，女人因為與他人連結並且對話，發現彼此相似的生命與生活經驗，在心理上產生譜同感，對於個人自我產生影響，過程中創造新生的自我知識(self-knowledge)可以解讀為對於自己的重新認識。

在研究田野中，成員們開始以自己的身分參與社區活動，或發掘的自己的興趣與學習慾望，在土風舞班的成員中，有擔任里長者為鄰里服務；有重拾過去對裁縫的喜愛，開始學習拼布，現在可以在家中開班授課；也有因為在社區活動中學習塑膠帶編織（可以編成籃子等實用物品）後，自己不斷研究變化新樣式，而由其他成員引薦至社區大學擔任編織老師。然而，成員們從過去家庭主婦的角色，轉而在家庭以外的領域空間逐漸佔有位置現身，過程中其實參雜許多模糊與進退掙扎：

就是我太好了所以老公才那麼在意，我常常會這樣想，這樣你就心安了，但是你就是收斂一下就好了，沒有必要的話老公不太贊同的話，兩個人至少興趣相同就好了(受訪者 B-06)。

(下學期還會去社區大學教課嗎?)現在要帶孫女，沒辦法了，(可以請先生幫忙嗎?)那要看他的臉色，還是不要好了(受訪者 I-03)。

這些進退的掙扎與選擇，若從 Butler & Wintram(1991)提出關於「女性自我的結構」來看是非常清晰的。這兩位學者在女性主義團體工作的實務經驗中發現，許多女性對自己的描述是依據其生理特徵（例如我很瘦小、我很胖等）或者外在事實狀況（例如我有三個小孩、我只是一个母親），很少有人對自己未來的目標或計畫有所想法，他們認為女性形成對自己消極否定的看法，與供應女性自我描述的一個結構的社會角色是息息相關的，並且主導著女性的社會化。而這個結構性的社會角色包含兩個面向，被鼓勵發展的「關懷自我」(caring self)以及遭到壓抑的「動力自我」(agential self)。

所謂女性的「關懷自我」，Butler & Wintram 引用 Gilligan(1982)在她對女性道德發展的研究中，提出男人在生活中的主要困境是生命與財產，相反的，女人則是圍繞在人際關係瓦解的衝突上。因此身為妻子與母親的角色往往被要求犧牲自己、成全他人的需求；而女性社會化的方式是對他人的情緒敏感，特別是男人，因此與他人的情感連結是女人的渴望，是女性行動的主要動力。女性的發展是在極其複雜事故的關係脈絡中產生的，而女性的「關懷自我」(caring self)就在其中萌生。也就是說，女性與他人良好的關係連結是需求滿足的來源，同時也成為女性評價自我的標準。

女性自我結構的另一面向 - 動力自我(agential self)，則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求與希望而行動的能力，其行動的動機核心是自己而非他人，藉此女性可以不由他人主導或限制地為自我作定義，勇於展現自信與勇氣，肯出頭甚至進一步影響環境與他人。然而，在父權社會中，女性的動力自我(agential self)的表達遭到抑制，尤其當女性進入家庭擔負起母職責任之後，「女性想要奉獻所學、樂於工作、服務社會、實現自己到底有什麼不對？為什麼當了媽媽之後，一切變得複雜難解？家庭內的性別分工先不利於女人，而不為女人解決問題的社會再

陷她於不義…（蘇芊玲，1998：16）。」實質的社會環境不利於女性從自身出發的行動，有時，更大的限制是存在於女性自身的，有些婦女在私人或公共領域中表現突出時，會感覺妨礙他人或自我利益的外化因而收斂自己，以解決其內在與關懷自我(caring self)的衝突。

社會上對於男性與女性特質的刻板劃分，鼓勵女性發展關懷自我(caring self)同時壓抑其動力自我(agential self)，而男性的自我發展則與女性相反，雖然在這樣的主流社會意識形態之下同時限制了兩性的自我發展，然而對女性而言，其限制與壓迫是更大的，原因是關懷自我在女性的生活中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並且形成女性自我認同的主要部份，但在主流的意識形態中，關懷自我(caring self)所展現的依賴、親密與滋養卻被認為是可厭、軟弱的性格。在關懷自我受到貶抑的情況下，女性也不被允許發展與自己未來目標相關的活動，而唯有支持他人、為他人獲益的行動才是可行的，在這種矛盾的情境中，往往使女性的個人界限變得模糊不明。

第七節 小結

本章是對於研究對象以土風舞班這樣一個純婦女團體為管道，跨出家庭進入社區的經驗歷程分析。

從一開始參與的時間點（成員多是在孩子就讀國中母職責任較為減輕之際），即凸顯了父權社會僵化的兩性分工，家務與母職被建構為女人責無旁貸的職責，女人在孩子長成母職工作鬆綁之際才獲得走出家門參與社區活動的合法性基礎。而在參與動機上，在田野訪談中歸納出三種動機，是婦女從主體而出發的需求，包括對「跳舞有興

趣」、「身體健康因素」以及「走出家庭與他人連」的需要，破除心理發展理論或社工、成人教育系統一直以來對於家庭主婦在孩子長成離家之際，參與社區活動的單一結論：爲了填補時間的剩餘與失落的心理感受，這樣的推論忽略了造成家庭主婦壓抑與失落的源頭，其實是母職與家務工作的社會建構過程剝奪了女性的生命選擇權，而在這樣的推論之下也使得婦女真正需求與聲音消失、無法被聽見。

在成員的參與過程中，策略的使用是爲了在父權的壓制下爭取具有正當性的空間，包括邀請成員的丈夫共同參與不定期的聚會活動，成爲團體的外圍網絡；維持純女性的團體；做好「家內事」；使活動過程透明，將跳舞界定爲運動健身活動。策略的此用顯示成員意識到父權的意識形態是走出家庭的阻礙，而所採取的應對方式並非激烈的對抗，而是在保全父權的前提下盡力爭取最大的空間，這樣的策略使用也使得成員有時因爲家庭裡的照顧需求（例如重拾母職）而必須離開團體回到家庭。

從學者 Weisman「物質空間」與「社會空間」的觀點，女人參與社區活動在實質的物理空間裡是跨出了家的門檻，擴大了移動與社區中現身的範圍，人際網絡與生活範圍均漸漸增長。然物質空間的擴展未必在社會空間上也獲得相同程度的進展，在土風舞班中默會的規範是不與父權體制衝突，做好女人本分爲優先，再談自己的需要與想望，因此成員們的因爲參與團體所漸次建立的社會空間是以若隱若現的樣貌存在。

在參與過程中，成員們不與父權對抗的策略選擇雖然使得成員有時仍必須在家門檻上進出，但是在團體中與其他女人連結，透過敘

說了解彼此有相同的生活與生命處境，破除過去各自在家庭私領域中孤立無援的心理感受，成員間逐漸發展的情誼使女人回歸以自我為主體的人際互動，藉由團體互動的過程也逐漸發展關於個人的知識，以團體情誼為後盾發覺自己的需求、興趣，並且在社區中佔據空間。